



中國古代文獻文化史專輯

古典文獻研究

(第十六輯)

南京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主辦

GuDian WenXian
YanJiu

中國古代文獻文化史專輯

古典文獻研究

(第十六輯)

南京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主辦

GuDian WenXian
YanJiu

國家“985工程”三期經費資助

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“中國古代文獻文化史”

(10&ZD130)階段性成果

鳳凰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 (C I P) 數據

古典文獻研究. 第十六輯 / 程章燦主編. — 南京 :
鳳凰出版社, 2013. 12

ISBN 978-7-5506-1933-3

I. ①古… II. ①程… III. ①古文獻學—中國—叢刊
IV. ①G256. 1-55

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 (2013) 第294976號

- | | |
|-------|---|
| 書名 | 古典文獻研究(第十六輯)
中國古代文獻文化史專輯 |
| 編者 | 南京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 |
| 責任編輯 | 林日波 |
| 出版發行 | 鳳凰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
鳳凰出版社(原江蘇古籍出版社)
發行部電話 025-83223462 |
| 出版社地址 | 南京市中央路165號, 郵編: 210009 |
| 出版社網址 | http://www.fhcbs.com |
| 經銷 | 鳳凰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|
| 照排 | 南京凱建圖文製作有限公司 |
| 印刷 | 江蘇鳳凰通達印刷有限公司
南京市六合區冶山鎮, 郵編: 211523 |
| 開本 | 880×1230毫米 1/32 |
| 印張 | 19.75 |
| 字數 | 588千字 |
| 版次 | 2013年12月第1版 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 |
| 標準書號 | ISBN 978-7-5506-1933-3 |
| 定價 | 78.00圓 |
- (本書凡印裝錯誤可向承印廠調換, 電話: 025-57572508)

主 編 程章燦

編輯委員會 (按姓名音序排列)

曹 虹 陳尚君 陳正宏

程章燦 叢文俊 杜澤遜

郭英德 姜小青 劉玉才

劉躍進 武秀成 徐 俊

徐有富 張湧泉 趙生群

執行編輯 趙 益

目次

文獻文化史研究

經學文獻的衍生和通俗化

——以近古時代的傳刻為中心 / 顧永新 (1)

明代通俗日用類書與庶民社會生活關係的再探討 / 趙益
(41)

書籍與蠻夷:《羸蟲錄》的歷史 / [美]何予明撰 時文甲譯
程章燦校 (60)

書估與清帝國的書籍流轉 / 徐雁平 (99)

文學文獻研究

馬融《廣成頌》、《上林頌》考辨 / 楊化坤 (159)

夏侯湛賦篇考述 / 何易展 (170)

《文選》錄揚雄六文而其五當來自《漢書》考

——兼論《揚雄傳·贊》以上本“雄之《自序》”非“未加裁割” /
力之 (185)

中日《不空表制集》文獻學研究述評 / 金程宇 (203)

宋代唱和詩詞總集叙錄 / 鞏本棟 (217)

域外漢籍中所見南宋江湖詩人新資料及其價值 / 卞東波 (233)

沈義父《樂府指迷》的版本問題與“詞忌用代字”說 / 于溯

(272)

沈周詩集編刻考 / 湯志波 (280)

關於陳忱和《東池詩集》 / 趙紅娟 (290)

《稽留山人集》初探 / 高 靜 (299)

戴震《屈原賦注》成書考

——兼論《安徽叢書》本《屈原賦注初稿三卷》爲僞書說 /

許子濱 (309)

《國粹學報》與晚清駢文學建構 / 張明強 (335)

文史新證

簡帛《老子》校讀札記 / 魏宜輝 (345)

毛詩切詞疏 / 孫立堯 (353)

杜預的經學條例及其學術自覺 / 赫兆豐 (375)

重審應璩與陶潛之詩學聯繫 / [美]林葆玲撰 卞東波譯 (391)

從箋注《洗兵馬》看《錢注杜詩》的特點 / 劉重喜 (421)

竹垞尺牘十通考釋 / 張宗友 (446)

評論與修改：明清小說評點的功能及意義 / 許景昭 (463)

《石精金光藏景錄形神經》與六朝道教的製劍術 / 孫 齊 (489)

君子原無死 傳經實可傷

——從《四書集注》批點看王伯沆之經學 / 程章燦 (504)

文獻考述與文獻校勘

《漢書·藝文志》總序獻疑 / 武秀成 (521)

丁祖蔭錄李文藻批校清初抄本《虞山錢氏絳雲堂藏書全目》述略 /

侯印國 (538)

《舊山樓書目》與趙氏藏書略論 / 劉 妍 (546)

《史記》局本吸收王念孫《史記雜誌》研究 / 王華寶 (558)

《全唐詩》叢考 / 趙庶洋 (567)

學術叢劄

《新唐書·方鎮表》獻疑 / 李軼倫 (582)

《唐會要》校誤 / 黃麗靖 (590)

論“一人”與“一德” / 辛明應 (606)

新發現的幾首汪辟疆詩詞 / 石慧中 張亞權 (616)

《古典文獻研究》稿約 (623)

《古典文獻研究》稿件書寫格式 (624)

經學文獻的衍生和通俗化

——以近古時代的傳刻爲中心

顧永新

在中國文化史上,近古(宋、元、明、清)是一個文化轉型的時期。由於城市的發展,市井文化的漫延,尤其是科舉制度的推廣,雕版印刷的廣泛使用,文學、學術、宗教、藝術等,均在不同程度上表現出民間化、世俗化、多元化的傾向。而經學作爲傳統學術的核心和根基,以及主流意識形態的代表形式,其直接的載體——經學文獻也是如此,在流傳和刊行過程中,由官方走向民間,由單一走向多元,由高雅走向通俗,不斷衍生出新的不同類型、不同級次的文獻,數量更大,受衆面更廣,普及程度更高,商業運作更多;與之相適應,內容和形式不斷地調試,以期滿足多層次、多用途的受衆需求。

經學文獻是中國經學的知識載體和表現形式,可以按照類目(如《易》、《書》等“十三經”及《四書》類、群經總義類、小學類等)、時代(上古、中古、近古)、傳本類型(簡牘、石經、寫本或抄本、刻本、活字本等)、記錄形式(文字、表格、圖像等)等不同的分類標準做不同的區分。其主體是儒家經典的原典以及以之爲核心的歷代編纂、注釋、校勘、考據等整理、研究成果。“十三經”的原典在先秦、秦漢時期俱已成書,並形成了比較穩定的文本;漢、魏、晉直至隋唐人爲之作注,是對原典的注釋;南北朝義疏及唐、宋“五經正義”、“七經疏義”,是對原典及其特定古注的再注釋。宋元刊行的諸經注疏合刻本,以及明清彙刻的“十三經注疏”就是這些經、注、疏(多附載《經典釋文》)的結集,我們姑且稱之爲正經注疏^①。這是一個垂直的、自足的系統,是整個經學文獻的核心,其

^① “正經正注”語出清張之洞《書目答問》,爲其書經部第一部類的類(轉下頁)

它系統的經學文獻都是由此衍生、孳乳而來的。隨着經學史上撥棄章句注疏之學、倡導義理之學的經學轉型期的結束,“五經四書”的宋元人新注不斷湧現,尤以朱熹及其學派的相關著作影響最大,南宋後期至元代既成主流,進入明代成爲獨尊的通行本。近古時代,其傳播範圍之廣、通行程度之高,是正經注疏所無法比擬的。朱學系統內部的傳承和發揚又使之形成新的垂直系統,即朱子等對於原典的注釋成爲新的經典,其弟子或後學爲之再作注釋,或稱注(傳、釋、解等),或稱疏(疏義、纂疏等),並將這個系統內外的各家說法加以彙編。當然,兩個系統之間既相對獨立,各自爲用,又有交集,相互交融,如元李廉《春秋諸傳會通》就是由正經注疏系統《左傳》注(杜預《集解》)、疏(孔穎達《正義》)和宋人“五經”系統胡安國《春秋傳》兩個源頭衍生出來的。雖有所側重,但更多地呈現出來的是二者的交集。本文立足於上述兩個相對獨立的系統,通過對各系統內部經學文獻的傳承、流變、編纂、刊行的考察,透視出近古經學文獻衍生的脈絡和規律,及其所表現出來的通俗化傾向。

這裏,我們引進級次文獻的概念,將兩個系統內部的經學文獻再作劃分,依次分爲一次、二次、三次、四次文獻,以期對各系統內部經學文獻有整體的、全方位的而又歷史的、有層次的認識,並進而探求各級次文獻之間衍生、孳乳的過程。

一 正經注疏的衍生與傳刻

正經注疏系統的一次文獻無疑就是《周易》、《尚書》、《詩經》、《周禮》、《儀禮》、《禮記》、《春秋左傳》、《春秋公羊傳》、《春秋穀梁傳》、《孝

(接上頁)目名稱。原注:“此爲誦讀定本,程試功令,說經根柢。注疏本與明監本五經,功令并重。”張氏所謂“正經正注”,兼指明清通行本“十三經注疏”和朱熹等宋元人新注“五經四書”,二者均爲元、明、清科舉程式所指定的。本文對“正經”的界定和使用有所不同。我們認爲,狹義的“正經注疏”專指傳統的“十三經注疏”經、注、疏,宋元以降“五經四書”及其相關著作並不從屬在內。這是因爲,在近古經學史上,朱學系統的“五經”新注和《四書章句集注》系列著作的通行程度、使用範圍及其深遠影響,已經遠遠地超出了傳統“十三經注疏”的範疇,儘管其最初的源頭依然是注疏,但確實已經形成了一個相對獨立的系統。所以,我們所使用的“正經注疏”範疇只是借用了張之洞原概念外延的一部分。

經》、《論語》、《爾雅》、《孟子》等“十三經”的原典。一次文獻本身既已包含豐富而複雜的語言文字、思想文化、歷史因革和學術傳承信息，不同時代、不同地域、不同人抄寫或印行更形成了不同版本，從而增加了其複雜性，削弱了其穩定性。這種版本異同的狀況在二、三、四次文獻中同樣也是存在的。二次文獻包括漢、魏、晉古注，間有隋唐舊注，是對一次文獻（原典）的注釋，所謂“正注”包括《周易》魏王弼、晉韓康伯注，《尚書》偽漢孔安國傳，《毛詩》漢毛亨傳、鄭玄箋，《周禮》鄭玄注，《儀禮》鄭玄注，《禮記》鄭玄注，《春秋左傳》晉杜預集解，《春秋公羊傳》漢何休解詁，《春秋穀梁傳》晉范寧集解，《論語》魏何晏集解，《孝經》唐玄宗注，《爾雅》晉郭璞注，《孟子》漢趙岐注等。當然，漢魏至隋唐的其它注解，如《周易》漢魏的孟喜、京房、荀爽、馬融、鄭玄、虞翻、王肅、干寶等注，《尚書》漢代的伏勝、馬融、鄭玄等注，漢代魯、齊、韓今文三家《詩》傳（或分內、外傳）、說、故，《左傳》漢代的賈逵、服虔等注，《論語》鄭玄注，古、今文《孝經》所謂的“孔傳”和“鄭注”等等，理論上也屬於二次文獻，只是由於政治、學術或地域、學派等方面的緣故未能成為“正注”。經傳（如《易經》和《易傳》、《春秋經》和三傳）原本各自單行，古注更是獨立於經傳之外別行。不過，六朝以後行世者，只有經注本而無單經本^①。也就是說，六朝以後一、二次文獻已合為一體，正經因正注而得以傳承有緒，正注因正經而獲得正統地位。三次文獻即所謂疏，是對原典及原典注釋的再注釋，大體可分為兩個階次：一是南北朝直至隋唐的義疏之作，今多已亡佚，傳世者有梁皇侃《論語義疏》；二是前揭正經正注的“疏”，包括唐孔穎達主持編纂的“五經正義”（《周易正義》、《尚書正義》、《毛詩正義》、《禮記正義》、《春秋左傳正義》）和賈公彥《周禮疏》、《儀禮疏》，徐彥《春秋公羊傳疏》^②，楊士勛《春秋穀梁傳疏》，以及宋邢昺等編纂的《論語疏》、《孝經疏》、《爾雅疏》（唐人賈、徐、楊所撰四疏連同宋人新修

① 王國維《五代兩宋監本考》卷上，北京圖書館出版社《宋元版書目題跋輯刊》影印本，2003年，第三冊，頁525。

② 清永瑤等《四庫全書總目》卷二六經部二十六《春秋》類一《春秋公羊傳注疏》提要從北宋董道《廣川藏書志》說，以為徐彥當在唐貞元、長慶以後（中華書局影印清浙江杭州刻本，1964年，頁211）。現在一般認為徐彥是北朝人。

三疏,北宋時由國子監校定刊行,稱之爲“七經疏義”)和舊題北宋孫奭所作《孟子疏》。實際上,唐宋人所作的疏(正義)是在前人義疏的基礎上完成的(如邢昺《論語疏》“大抵翦皇氏〔《義疏》〕之枝蔓,而稍傳以義理”^①),基本上涵蓋了其主體內容(個別的疏直接以前人舊疏爲藍本,如唐元行冲爲玄宗《孝經注》作疏,而邢昺疏所依據的正是《元疏》)。疏(正義)原本單行(單疏本),直到南宋才出現注疏合刻本,經、注、疏合刻,至此一、二、三次文獻合而爲一。當然,這并不排除同時及其後并行的單經(白文)本、經注本、單疏本等其它類型正經刻本的存在。

從時代上劃分,正經注疏的一次文獻均產生於先秦、秦漢,二次文獻主要是漢、魏、晉古注,及個別隋唐舊注,三次文獻則是南北朝直至唐宋由一、二次文獻衍生出來的。二次、三次文獻之外,唐宋以降正經的其它注釋(之所以沒有把這部分注釋列入二次文獻,是因爲這些經注多係參酌漢魏古注和唐宋疏義之作,并非單純地植根於原典的原始文本)以及歷代以序跋、札記、評點、校記、解題等其它形式出現的相關研究論著,連同經學文獻的整理成果,如歷代公私目錄和史志目錄中的相關著錄、經學文獻專科目錄、各種經書選本、節本、經學叢書、各種相關著作中保存下來的校勘和訓詁資料等,則是四次文獻。就四部分類目錄的經部類目而言,群經總義類(如鄭玄《駁五經異義》、陸德明《經典釋文》)著作基本上都屬於四次文獻。樂類是比較特殊的,無一次文獻^②,《漢書·藝文志》所著錄的《樂記》等篇可視爲二次文獻,而後世諸書多爲四次文獻,如宋陳旉《樂書》、蔡元定《律呂新書》等。禮類除了《周禮》、《儀禮》、《禮記》三禮之屬,還有三禮總義(如宋聶崇義《三禮圖集注》)、通禮(如朱子《儀禮經傳通解》)、雜禮書(如宋陳祥道《禮書》)之屬,大體上也都是四次文獻。總之,四次文獻是由一、二、三次文獻衍生出來的整理、研究著作。

(一) 經注本

雕版印刷儒家經典始於五代,最先刊行的是一、二次文獻的結合

① 《四庫全書總目》卷三五經部三十五《四書》類一《論語正義》提要,頁291。

② 古文經學家認爲,先秦有六經,秦火以後,《樂》經亡佚,漢代以降只有五經。今文經學家主張《樂》本無經。

體——經注本。自後唐長興三年(932)馮唐、李愚請令國子監校定、刊行九經^①，至後周廣順三年(953)判國子監事田敏等進印板九經書^②，前後歷經四朝二十餘年，在中國印刷史和經學史上都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事件。五代監本九經的經數實為十二經，所謂九經三傳，與唐代開成石經相同，包括《易》、《書》、《詩》、三禮、三傳及《孝經》、《論語》、《爾雅》，附以《五經文字》、《九經字樣》。北宋開國之初繼續沿用，到了中期，由於版片多殘損、漫漶不可識，於是相繼重刊諸經經注本。儘管太宗已有動議^③，但全面的校勘工作還是從真宗朝開始的。景德二年(1005)啟動，工作比較分散，持續時間較長，所以直到天禧五年(1021)以後才結束^④。靖康之亂，不僅北宋國子監所刻書悉數被運往燕京，連同書版也為金人擄掠以北去，損失殆盡^⑤。南宋國子監又據北宋監本翻刻，包括經注本和單疏本；當然，所謂南宋監本實際上都是由江南各州郡刊刻、再將版片送往國子監的^⑥。

① 宋薛居正《舊五代史》卷一二六馮道本傳提及“(後唐明宗)時以諸經舛繆，與同列李愚委學官田敏等，取西京鄭覃所刊石經，雕為印版，流布天下，後進賴之”(中華書局，1976年，第五冊，頁1658)。

② 宋王溥《五代會要》卷八《經籍》載：“周廣順三年六月，尚書左丞兼判國子監事田敏進印板九經書、《五經文字》、《九經字樣》，各二部，一百三十冊。”(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78年，頁128)

③ 據元脫脫等《宋史》卷四三一《儒林一》李覺本傳，淳化初，“上以經書板本有田敏輒刪去者數字，命(李)覺與孔維詳定”(中華書局，1977年，第三十七冊，頁12821)。又宋周應合《景定建康志》卷三三《書籍》曰：“雍熙中，太宗皇帝以板本九經尚多訛謬，重加刊校。”(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本，以下簡稱四庫本)

④ 宋王應麟《玉海》卷四三《景德群書漆板刊正四經》，江蘇古籍出版社、上海書店影印光緒中浙江書局刊本，1987年，第二冊，頁814。

⑤ 宋徐夢莘《三朝北盟會編》卷九八靖康中軼七十三《諸錄雜記》引趙鴻臚子砥《燕雲錄》曰：“靖康丙午冬，金人既破京城，當時下鴻臚寺取經板一千七百片。時子砥實為寺丞，兼是宗室，使之管押，隨從北行。”(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7年，上冊，頁723)

⑥ 宋魏了翁《毛義甫居正〈六經正誤〉序》記述頗詳，其文有曰：“南渡草創，則僅取版籍於江南諸州，與京師承平監本大有徑庭，與潭、撫、閩、蜀諸本互為異同，而監本之誤為甚。”(《鶴山先生大全文集》卷五三，《四部叢刊》影印劉氏嘉業堂舊藏宋刊本)

五代監本九經今皆不存，日本室町時代南北朝覆宋刊本《爾雅注》三卷，卷末尾題及經注字數二行，另葉空兩行低三字題“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臣李鶚書”一行。這是今天能够看到的、間接反映監本九經面貌的唯一版本實物。光緒中，楊守敬訪得此本之影抄本，將其刻入《古逸叢書》，題作“影覆宋蜀大字本”，書後有其光緒九年(1883)跋^①，判定“此本爲翻蜀大字本。其不題長興二年者，蓋翻刻時去之”。1973年，日本古典研究會影印神宮文庫藏覆宋刊本。長澤規矩也先生撰《神宮文庫藏舊刊本〈爾雅〉解題》，也認爲神宮文庫本保存了五代蜀刻本的面貌。實際上，與日本覆宋刊本的底本同版的南宋刻本在中國尚有子遺，原爲汲古閣舊藏，清代歸畢沅經訓堂，後入清宮內廷收藏，今存“臺灣故宮博物院”。全書保存基本完好，僅卷末二葉散佚，毛氏以仿宋字體精寫抄配，無李鶚書一行。從刻工和避諱來推斷，當刻於孝宗朝。王國維《覆五代刊本〈爾雅〉跋》和張允亮《故宮善本書志》^②都否定此本是蜀刻本，以爲南宋國子監覆刻北宋監本；昌彼得先生進一步證實其爲“南宋浙刻版歸監中印本”^③。

(二) 從附刻《釋文》到經注附《釋文》本

作爲國家頒布的標準文本，兩宋監本書版允許吏民刷印，并頒行地方，准予翻刻，進一步促進了經書的推廣和流通，也使得經注本統一在監本系統之內，從而出現了衆多的官刻本和坊刻本。南宋官刻經注本以撫州公使庫和興國軍學刻本最稱善本。撫州公使庫淳熙中原刻、咸淳中補刻“九經三傳”^④；興國軍學南宋初刻、嘉定中修補、補刻“六

① 又見於清楊守敬《日本訪書志》卷三“影鈔蜀大字本”《爾雅注》三卷解題，《日本藏漢籍善本書志書目集成》影印本，北京圖書館出版社，2003年，第九冊，頁133—136。

② 《圖書館學季刊》第四卷第三、四期，中華圖書館協會，1930年。

③ 昌彼得《蟬庵群書題識·跋宋監本〈爾雅〉》，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97年，頁46—49。

④ 南宋孝宗淳熙中，撫州公使庫刊行“六經三傳”——《周易》、《尚書》、《毛詩》、《禮記》、《周禮》及《春秋》三傳。度宗咸淳九年(1273)，黃震補刻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和《孝經》，於是有所謂“九經三傳”(參見宋黃震《黃氏日抄》卷九二《修撫州六經跋》，元刻本，“中國基本古籍庫”收錄本)，并修補、印行舊刻《儀禮》(同〔轉下頁〕)

經”^①。這兩種官刻本都源出國子監本，刊刻群經的同時并刻陸德明《經典釋文》各經音義，依經別行，配套出現。《經典釋文》包括除《老》、《莊》以外“九經三傳”凡十二經的音義，以經為單位，經文、注文均出文注音釋義，兼及異文，集六朝音義著作之大成，為唐宋以降研讀經書的必備工具書。它的校刊可以追溯到五代後周，也是由國子監主持的，各經單行，依次進行，開始於監本九經刊刻完成之後不久，全部校定工作直至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（1008）始告竣^②。正是由於五代、北宋監本《經典釋文》各經單行的出版模式，因此宋代官刻群經經注本往往與《釋文》同時刊印，相輔而行（我們頗疑南宋監本亦是此例，因無直接的版本實物為證，暫付闕疑）。

這種附刻《釋文》的形式固然可以及時查對音義，但翻檢仍嫌不便，於是南宋初坊間開始出現了經注附《釋文》本，將各經《釋文》打散，依次分別插入相應的被釋經文、注文之下，省却翻檢之勞，頗為便利。作為一種過渡形態，早期的經注附《釋文》本并非逐句附《釋文》，而是將經、注文分段，相應的《釋文》置於整段之後，即《九經三傳沿革例·書本》所謂“又於本音義不列於本文下，率隔數葉，始一聚見，不便尋索”。今存高宗朝鶴林于氏家塾棲雲閣刻本《春秋經傳集解》，存二十九卷（一至九、十一至三十），正是這種體式。孝宗淳熙至光宗紹熙中，建安余仁仲萬卷堂刊刻

〔接上頁〕卷《修撫州〈儀禮〉跋》。今存撫州公使庫刻本計有四種：淳熙刻南宋遞修本《周易》九卷、《略例》一卷（藏中國國家圖書館，以下簡稱國圖；卷七以下補配清影宋抄本）、淳熙四年刻本《禮記》二十卷、《釋文》四卷（國圖藏足本，臺灣“中央圖書館”藏殘本，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僅藏《釋文》）、淳熙刻南宋遞修本《春秋經傳集解》三十卷（清宮天祿琳琅舊藏殘本，今分藏“臺灣故宮”和國圖，二者合璧，尚缺七卷）、淳熙刻重修本《春秋公羊經傳解詁》十二卷、《釋文》一卷（國圖藏）。

① 興國軍學南宋初刊行《周易》、《尚書》、《毛詩》、《周禮》、《禮記》五經。寧宗嘉定七年（1214），軍學教授聞人模等修補舊版，并補刻《左傳》，九年畢工。日本宮內廳書陵部藏《春秋經傳集解》三十卷、《經傳識異》一卷（卷三至四、二十至二十一、二十六至二十八抄配）。靜嘉堂文庫藏殘本十五卷，存卷十、十五至二十、二十三至三十；國圖藏殘本一卷，存卷二十二。日本尊經閣文庫藏興國軍學刻本《春秋左氏音義》五卷，正是刊刻《集解》之時附刻的陸氏《釋文》。

② 參見《玉海》卷四三《開寶校釋文》和卷五五《祥符賜莊列子》，第二冊，頁812和頁1055。

經注附《釋文》本“九經三傳”^①，已經是標準的、逐句附《釋文》的體式。

理宗景定元年(1260)至度宗咸淳末年(1274)，廖瑩中世綵堂刊刻九經^②。清宮天祿琳琅舊藏廖刻《春秋經傳集解》殘本^③，嘉慶中毀於火。今存相臺岳氏荆溪家塾和盱郡兩種元代重刊本^④，均忠實地覆刻原本，故今日尚可略窺廖本之面貌。在余仁仲本的基礎之上，廖本對所附《釋文》又做了減省和改動，《四書》部分還間採“文公音”。可見，經注附《釋文》本是由單純的經注本附刻《釋文》衍生出來的，所附《釋文》經過不斷的增刪、改易(先後有興國于氏、建安余氏、廖氏世綵堂等刊本)，目的是便於閱讀，迎合當時學校教育、科舉考試及經術研修的多重需求。

今存宋刻經注本(含附《釋文》本)以《春秋經傳集解》為最多，版本最為複雜。而明代刊刻的經注附《釋文》本《春秋經傳集解》幾乎都是“淳熙小字本”(南宋淳熙三年閩山阮仲猷種德堂刻本)和元相臺岳氏荆溪家塾刻本這兩種宋、元本的覆刻或翻刻本。十行十八字本出自前者，八行十七字本出自後者，可見其影響之大，通行之廣。今存“淳熙小字本”清人多著錄為宋刻本，分藏中國大陸、臺灣地區和日本的多家藏書機構。我們探究相關文獻著錄，比勘版式、行款、字樣及異文，可以判知傳世各本實為兩個系統的明代覆刻本，分別源出同一祖本——淳熙種

① 余仁仲萬卷堂所刻“九經三傳”實為十一經，即《周易》、《尚書》、《毛詩》、《禮記》、《周禮》及三傳、《論語》、《孝經》和《孟子》。今存余仁仲刻本有四種：《禮記》二十卷(國圖藏足本及殘本各一部，上海圖書館藏殘本兩部)、《春秋經傳集解》三十卷(臺灣“中央圖書館”藏殘本，存六卷)、《春秋公羊經傳解詁》十二卷(國圖和“臺灣故宮”各藏一部)、《春秋穀梁傳》十二卷(“臺灣故宮”藏殘本，存六卷)。各本版式、行款大體相同，均為細黑口，左右雙邊；每半葉十一行，經文大字十八九字，注文小字雙行二十七字。

② 廖刻九經分別是《周易》、《尚書》、《毛詩》、《禮記》、《周禮》、《春秋經傳集解》、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和《孝經》。參見張政烺先生《讀〈相臺書塾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〉》(發表在《中國與日本文化研究》第一輯，1991年；後收入《張政烺文史論集》，中華書局，2004年，頁166—188)。

③ 清于敏中等《天祿琳琅書目》卷一宋版經部著錄其書，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，1992年影印光緒中王先謙校刻本，頁15—18。

④ “臺灣故宮”藏元盱郡覆刻本《論語》十卷、《孟子》十四卷，天祿琳琅錄外書。元相臺岳氏荆溪家塾覆刻本傳世較多，有《周易》十卷(國圖藏)、《春秋經傳集解》三十卷(國圖藏足本，靜嘉堂文庫藏殘本)、《論語》十卷(國圖藏)、《孟子》十四卷(國圖藏)、《孝經》一卷(國圖藏)、《周禮》十二卷(“臺灣故宮”藏殘本)等。

德堂本，先後兩次刊刻，一刻於中葉以前，一刻於嘉靖中。兩本各自別行，行款相同，版式相近，有異文，二者之間並無直接的覆刻關係。前者刊刻質量較好，異文佳勝者較多，有修、補版；後者多保留種德堂牌記，後印本經過修、補版或變換、剗改牌記。而真正的“淳熙小字本”恐已不存於天壤間矣。由這一個案的考索不難看出，在經書版本衍生的過程中充滿了不確定性，明代的兩個覆刻本源同流別，每個系統內部又有先、後印、修、補版以及版片轉讓等複雜情況，較之其所從出之原刻本均有不同程度的變異。

（三）纂圖互注重言重意本

爲了滿足士人科舉備考以及各級學校教育的需求，便於閱讀、理解，繫聯、貫通關鍵詞，歸納、總結知識體系，南宋中期至宋末又從經注附《釋文》本中衍生出纂圖互注重言重意本，由建陽地區的書坊刊行，流傳廣泛，大行於世。其書名目繁多，如纂圖互注、重言重意、互注點校及監本、京本、婺本等，不過是吸引讀者眼球，內容上並無實質性的差異，往往陳陳相因，輾轉相承。經、注文多施以句讀或發字（唐宋標注四聲的方法，以圓圈或墨點分注字的不同位置以示平、上、去、入四聲），本文之前多插配相關圖畫或圖表（內容涉及天文地理、器物服飾、傳授統緒、知識體系等等）即“纂圖”，“曰重言者，本經相同之句；曰重意者，句似而意同之文；曰互注者，他經所引之語”^①。此外，還有似句（大體相當於重言，指本書中相似之句）、重篇（僅見於《毛詩》，指篇名重複之詩）等。各書體式不一，或具其一二，或兼具多項。

張麗娟教授對纂圖互注重言重意本的版本系統進行了全面的考察，根據書題、版式、行款、體式、開本等特徵，將傳世刻本大體劃分爲六個系統：① 十一行纂圖互注本，中字本，書前有纂圖，有互注、重言、重意等內容，書題作“纂圖互注某經”，十一行二十一字，今存《周易》（臺灣“中央圖書館”藏）、《尚書》（國圖和哈爾濱市圖書館藏殘本；日本京都圖書館藏本爲南宋建安宗氏刻本，與之并不同版，但有覆刻關係）、《禮記》（陸心源舊

^① 清瞿鏞《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》卷二經部二宋刊本《婺本點校重言重意互注尚書》十三卷解題，中華書局《清人書目題跋叢刊》影印本，1990年，頁32。

藏,今藏靜嘉堂文庫)。^② 十二行纂圖互注本,亦有纂圖、互注、重言、重意等內容,書題亦作“纂圖互注某經”,十二行二十一字,今存《周禮》(國圖藏兩部,一為鐵琴銅劍樓舊藏,一為袁克文舊藏,二者有明顯的覆刻關係,但不同版;靜嘉堂文庫藏本亦為陸心源舊藏,與國圖兩藏本相近,但有明顯差異)、《禮記》(國圖藏)、《春秋經傳集解》(附《春秋名號歸一圖》二卷,龍山書院本,袁克文舊藏,今藏國圖)、《毛詩》(“臺灣故宮”藏)。^③ 九行巾箱本,九行十七字,書題無冠詞,止標經名,不附纂圖,僅有重言而無其它。今存《周禮》(日本足利學校遺迹圖書館藏足本十二卷;國圖藏殘本兩部,一為鐵琴銅劍樓舊藏,一為天祿琳琅舊藏,兩本當有覆刻關係,後者與足利本同版)、《禮記》(日本國會圖書館藏)、《春秋經傳集解》(日本國會圖書館藏)。^④ 十行“監本”,書前有纂圖,本文有互注、重言、重意等內容,書題大多作“監本纂圖重言重意互注點校某經”,十行十八字(間有十九或二十字者)。《監本纂圖重言重意互注點校毛詩》(國圖藏殘本兩部,一為黃丕烈舊藏,卷五至七補配影宋抄本;一為陳鱣舊藏,存卷一至十一及圖譜一卷。兩本不同版,當有覆刻關係)、《監本纂圖重言重意互注禮記》(上海圖書公司藏本,毛氏汲古閣舊藏)、《監本纂圖春秋經傳集解》(南京圖書館藏本,明安國桂坡館舊藏)、《監本纂圖重言重意互注論語》(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南宋劉氏天香書院刻本,楊守敬、袁克文舊藏)、《監本纂圖重言重意互注點校尚書》(《四部叢刊》據劉氏嘉業堂藏本影印,原本今不知所在)。^⑤ 十一行“京本”,開本為巾箱本,十一行十九至二十字,有互注、重言、重意等內容,書前無纂圖,書題均冠以“京本”二字。《京本點校附音重言重意互注周禮》(北京大學圖書館、上海圖書館各藏殘本一部)、《京本點校附音重言重意互注禮記》(國圖、上海圖書館各藏殘本一部)、《京本點校重言重意春秋經傳集解》(湖南圖書館藏殘本;吉林大學圖書館藏零本卷二十九,書題作《京本點校附音春秋經傳集解》)。^⑥ 十行“婺本”,開本為巾箱本,十行二十字左右,有互注、重言、重意等內容。《婺本點校重言重意互注尚書》(“臺灣故宮”藏本,陳鱣、鐵琴銅劍樓舊藏)、《婺本附音重言重意春秋經傳集解》(上海圖書館藏殘本)。此外,還有個別零星傳本,如國圖藏宋刻本《毛詩詁訓傳》、《附音重言互注禮記》、上海圖書館藏宋刻本《東萊先生呂成公點句春秋經傳集解》等。上述六個系統內部各本具有相同或相近的版刻特徵,但并不一